

东京汤岛书籍馆:日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刘颖, 廖远丽, 胡大敏

摘要 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时期, 日本积极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先进国家, 西方图书馆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归国之后, 这些学者将所见所闻所想记录成册, 积极投身于日本公共图书馆建设。1872年, 日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东京汤岛书籍馆开馆, 随后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日本图书馆事业迈进了新时期。

关键词 欧美国家 东京汤岛书籍馆 使团 日本

引用本文格式 刘颖, 廖远丽, 胡大敏. 东京汤岛书籍馆: 日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建立[J]. 图书馆论坛, 2019, 39 (12): 69-75.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First Public Library: Tokyo Yushima Library

LIU Ying, LIAO Yuanli, HU Dami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okugawa Shogunate and Meiji, Japan had actively sent missions to visit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librarie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Japanese scholars. After returning home, these scholars recorded what they saw, heard and thought in book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public libraries. In 1872,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Japan, Tokyo Yushima Library, was successfu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nd then libraries in other regions mushroomed as well. The librarianship in Japan stepped into a new era.

Keyword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okyo Yushima Library; diplomatic corps; Japan

0 前言

纵观世界图书馆发展史, 日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少学者将明治政府的成立视为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新阶段的开端, 认为是日本“文库”时代与“公共图书馆”时代的水分岭。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 受汉字文化影响, 无论是王公贵族, 还是儒士学僧, 均热衷于收集汉籍。当时“公共图书馆”一词还未出现, 用“文库”代指收藏珍贵书籍的场所。随着历史的变迁, 日本文库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无论是藏书数量还是典藏类型, 都越来越多样化, 比如天宝年间设立的红叶山文库, 典藏书籍接近

5,000部, 其中的很多书籍后来都被收藏于日本公共图书馆中。由此可见, “文库”作为明治维新前期的产物, 不仅侧面反映了日本学者对知识的重视, 更对之后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1]。

在幕府末期与明治政府成立后, 为摆脱民族危机以及来自西方的压迫, 寻找新的发展出路, 一些使节和留学生被派遣到欧美国家学习现代化知识和管理体制, 福泽谕吉的出使、萨摩藩派遣留学生以及岩仓使团出访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福泽谕吉出访归来后所著的《西洋事情》中, 除了阐述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之外, 还特别包含了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介绍。

此外，在由岩仓使团出访记录编撰而成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以及教育专员田中不二磨所著的《理事功程》中，也均有对欧洲图书馆包括馆藏来源、构成以及运营情况等等的详细介绍，这些记录对后来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有观点认为日本公共图书馆可以视为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2]。

1 德川幕府派遣出访

1.1 背景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国内环境在经过实施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制定的一系列稳定政策后，正从混乱走向统一，社会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丝类等生活用品的需求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愈加频繁^[3]。但是这种开放的贸易政策并未持续太久，自1633年2月起，幕府陆续颁布了多条“锁国”政策，限制本地商人与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甚至断绝了日本与一些盟友国家的贸易关系，形成了完全的“锁国体制”。

就在德川幕府全面实行“锁国”政策的时候，英国、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科技以及军事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1840年，为了转移国内市场矛盾，英国借虎门销烟为由，对当时的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因战败签订的《南京条约》成为了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然而事件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不断扩展到了更多的亚洲国家。尽管现在无法考究这些消息是如何为日本民众学者所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战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学者和政客开始反思自身的政治制度是否合理有效，可以说，中国的战败不仅敲醒了本国的民众，更间接地推动了日本改革的实施^[4]。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就有不少有识之士质疑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1783年，工藤平助作《赤蝦夷风说考》对幕府当时的“锁国”政策进行了批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指出“锁国”政策不仅不会使日本国力强大，反而会拉大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使日本处于发展落后的地位。1853年发生的“黑

船事件”证实了这种担忧。面对气势汹汹的西方列强以及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国门向这些国家敞开，而实施了百余年的“锁国”政策也随之土崩瓦解^[5]。

由于“锁国”政策的瓦解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德川幕府自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派遣了多支使团出使欧美，一方面是为了与这些国家谈判；另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在出使过程中，使团成员们对所见所闻均作了记录，这些记录为之后日本科技的革新与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陈出新的重要作用。

1.2 1860年出使美国

为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学习美国经验，德川幕府派遣一支由77人组成的使团出使美国，该使团于1860年(万延元年)在美国军舰编队的帮助下访问美国。整个访问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日记，比如村垣范正的《航美日记》、木村喜毅的《赴美大使之旅》、新见正兴的《美行咏》等等^[6]。这些日记中不乏关于美国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描述，成为了之后使节向幕府提出政策改革的依据，其中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就是重要的一条。

根据村垣范正《航美日记》的记载，这一天阳光明媚，日本使团一行人在完成条约批准之后，受邀在下午参观美国国事馆，并于次日参观美国议事堂，这些参观都弥足珍贵^[7]。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尽管当时日本遣美使节团参观的是第二次重建之后的国会图书馆，但其场馆建设、馆藏书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仍然使随行使节们深感震撼，他们将其详细记录在随行日记中，以期回国后为图书馆和博物馆建设提供参考^[8]。使节团成员之一的日高为善就曾在其记录中对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构造进行了描述，并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9]。田中一贞还记录了他们在参观中发现的一本介绍日本文化和语言的书籍，书中关于日语中片假名、平假名的解释，以及相关文化特征的描述详尽。使团成员们对美国国会图书馆之行的记录对日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成功设立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和实践价值。

1.3 福泽谕吉与《西洋事情》

福泽谕吉对西方文化和思想在日本的传入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日本的伏尔泰”。他的一生著作斐然，其所著的《西洋事情》和《劝学篇》时至今日依然在日本文坛和教育界有深远的影响^[10]。

福泽谕吉的首次海外访问是随着1860年赴美使节团进行的，当时他作为使节木村喜毅的随从前往。随后，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方先进文明，从而推动本国的体制改革，福泽谕吉带领使节团再次访问西方国家^[11]。

1860年出使美国，福泽谕吉见识到了与其原生环境完全不同的民风民俗，美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他的开国主张。1862年，福泽谕吉、洪木弘安等人组成代表团乘坐英国军舰开始了他们的英国访问之行。在这次访问之旅中，福泽谕吉不仅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还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学校、医院、图书馆等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制度。归国之后，福泽谕吉凭借自己海外访问的所见所闻所想，完成了《西洋事情》一书。有学者认为，正是《西洋事情》这本书打开了日本学者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使更多日本有识之士被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所影响，逐渐从崇尚儒家思想转变为维新改革的思想，从而开启了日本近代文明的新篇章^[12]。

《西洋事情》分为初篇、外篇以及二篇三部分，每个部分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初篇重点介绍了福泽谕吉所游历的欧美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结构等，相较之下，外篇和二篇则更关注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制度、教育等方面状况。在这三个部分中，均有关于西方国家“文库”的描述，这里所指的“文库”就等同于现在的图书馆。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是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传入日本的起点。

在《西洋事情》的初篇中，有关于伦敦文库、巴黎文库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文库的描述。描述内容不仅包括这些文库的藏书数量和藏书类型，还着重介绍了这些文库的一些借阅制度，比如在这些文库中，公众可以自由阅读，但无法借

阅。这些记录相较于万延元年遣美使团关于图书馆的介绍更加细致具体，从原本仅仅关注图书馆本身开始转变为关注图书馆的运营制度。

《西洋事情》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介绍促使了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在日本生根发芽。自此，越来越多的访问使团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及其制度建设，并将获得的信息及经验进一步在日本本土传播发扬。

2 日本早期公立图书馆的建立背景

2.1 萨摩藩派遣留学生

中国鸦片战争战败和《南京条约》签订，以及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的武力胁迫，日本实力最强的藩属地之一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战败，使日本的民族危机感进一步增强。日本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的重要性。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萨摩藩逐步推行变法改革，在此期间，不少改革者提议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和使节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知识，并购买军事器械^[13]。

为完善派遣留学生的具体措施，萨摩藩开成所教授石河确太郎撰写《石河确太郎寄给大久保一藏呈报书》，不仅指出了被派遣人员的选拔标准，而且对被派遣人员在英国所学的专业以及人员构成作了细致安排，还对留学费用作了详细的规划。最终萨摩藩政府于1865年4月17日派出了近20人组成的使节团出访英国，希望借此次出访能更为全面地了解当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及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进知识^[14]。

萨摩藩留学生一行人在英国留学生活期间，将其经历和体验都进行了记录。日本博物馆首位馆长——町田久成就是这批赴英留学生中的一员，归国后他不仅向政府提议建立博物馆，而且还为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作出了极大地努力^[15]。

2.2 町田久成和畠山义成

由于当时赴英留学生的宿舍毗邻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因此，町田久成有很多机会到这些地方进行参观学习。留英期间，他还参加了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对西方拥有的先进文明和科技感到深深震惊。结束此次博览会参观后，町田久成积极推进日本博物馆和图书

馆的设立。归国后，他很快在明治政府任职，1868年被任命为参与兼外国事务科的外国事务员，其后相继出任数职。长期就任与外国事务有关的职务以及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的经历，使町田久成深刻地感受到提高日本民众知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他向当局政府倡议建设日本本土的博物馆来普及民众的认知。正是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东京帝室博物馆及其下属的图书馆才得以建立。1882年，他被任命为东京帝室博物馆的首位馆长，也被后人视为“日本博物馆之父”^[16]。

和町田久成不同，畠山义成在留英生涯结束之后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1873年归国后投身于日本的教育事业。拥有多年海外留学经验的畠山义成，对西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因此在学成归国之后马上被当时的明治政府委以重任。他不仅曾担任日本最高学府的首任校长，还曾被委任为东京博物馆馆长。可以说，畠山义成成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事业、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博物馆的持续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7]。

2.3 东京汤岛书籍馆建立概况

1872年3月，日本文部省博物馆在汤岛圣堂大成殿(现在在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举办国内首次博览会。在博览会上，町田久成呼吁政府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他指出，自维新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政府急需遣派高素质人才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回来建设祖国，因此修建一个提供公共获取知识的场所——书籍馆迫在眉睫。而对于书籍馆的选址，町田久成建议将其设在人流量较多的街区，这样不仅便于普通大众阅读借阅，也便于人才的培养和交流^[18]。

当时町田久成提议建立的图书馆就是日本初期的公立图书馆——东京汤岛书籍馆。此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逐渐完善了自身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体制建设，在这样一个时期提出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是符合当时日本经济文化需求的，因此，他的提议在1872年获得了批准。在其提议之上，日本文部省及博物局更进一步完善了书籍馆设立的具体措施。

根据文部省书籍馆设立时制定的规则可知，

最初的书籍馆只是博物馆下设的一个部门，旨在收集世界各地的经典书籍。书籍馆向普通民众开放，不再仅限于私人目的使用，并且书籍馆也欢迎日本各地有识之士的捐赠和帮助，受到捐赠之后会以“借阅书籍的许可票”作为答谢^[19]。为了更有效率地运营和管理书籍馆，日本文部省和博物局还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读者的借阅行为。这个规则对读者的借阅条件、时间限制以及书籍分类等内容作出了详细的阐述。虽然此时的书籍馆已经向日本普通民众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从一些规定可以看出书籍馆提供的是差异化服务。

书籍馆的借阅并非是无偿的，日本民众需要支付一些费用来获取和借阅书籍馆的资源。当时书籍馆的藏书，主要分为两大类：甲类和乙类。甲类意味着书籍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学术价值，这些书籍仅提供给高等学者借阅；乙类则涵盖较为常见的书籍，可供普通读者借阅。而书籍馆的借阅费用，一方面会根据所借书籍的类别而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会因借阅的时长而不同。通常来说，甲类书籍的借阅费用会是乙类书籍的两倍，并且若读者借阅了甲类书籍，还可以同时借览乙类书籍；对于借阅的时长，书籍馆设立了4种不同的选择，即半月、一月、半年和一年，借的时间越长，读者需要承担的费用也就越高^[20]。

尽管书籍馆设立的借阅费用并不是很高，也很符合当时日本的经济情况，但是普通民众的参与度并不是很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日本民众的主要诉求还是温饱问题的解决，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热情并不是很高；另一方面在于此时的书籍馆提供的是差异化服务，限制了一些处于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借阅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人民获取知识的热情和动力。

1872年建立的书籍馆经历众多变迁，不少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书籍由于保管不当而丢失，造成重大损失，最后迫于无奈文部省将其藏书贡献出来，作为1875年书籍馆重新面向公众的起始藏书，并将书籍馆正式改名为东京书籍馆。书籍馆重新开馆一年之后，员工共计十余人，藏书类型不再局限于图书，还涉及杂志和报纸，并且这两种书刊的种类都达到了近百种，书籍的藏书

量也达到了3万册之多，每天来书籍馆借阅的读者近百人次。可见随着书籍馆运营的日益成熟，公众获取知识的热情也逐渐高涨。

1872年东京汤岛书籍馆与1875年东京书籍馆的成功开馆，使日本图书馆事业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让更多的日本普通民众接触到了珍贵且先进的知识文化，提升了民族的文化意识。在上述两个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建立之后，日本其他地区也开始开设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见表1)，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获取知识的场所和渠道。

表1 明治初期日本各地图书馆建馆时间

年份	地点	图书馆
1876	大阪府	府立大阪书籍馆
1876	浦和	县立浦和书籍馆
1878	静岡	县立静岡师范学校附属书籍馆
1878	广岛县	广岛县博物馆附属书籍室
1879	高知县	县立高知书籍馆
1879	秋田县	县立秋田书籍馆
1881	宫城县	县立宫城书籍馆

数据来源：粟田武夫，小川刚. 明治·大正期公共图书馆研究序说[M]. 东京：日本图书馆协会，1968.

3 岩仓使团

明治政府成立后，一方面要应对国内加剧的经济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国力，摆脱民族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由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被任命出使欧美。

明治初期派遣的岩仓使团是日本近代初期出访欧美国家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使团，使团以“求知于世界”为目的，由48名官员和59名留学生共同组成，于1871年12月出发前往美国，随后历访了十多个欧洲国家，共历时近1年9个月^[21]。

在使团出访欧洲诸国时，岩仓命人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在册，最终形成了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这本实记，不仅对欧美国家的军事机械、医疗卫生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对访问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建设进行了阐述，其中就包括对这些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介绍。《理事功程》是由当时使节团中时任教育专员的田中不二磨归国后创作的，他从教育学视角着重记录了访问各国图书馆的情况。两

本历史巨著中关于世界各国图书馆的详细介绍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变革和发展^[22]。

3.1 《特使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中“图书馆”的记录

《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是由使节成员久米邦武以报告的形式编纂而成，共5编5册100卷，记录内容涉及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等一切经济文化活动，让日本全面认识到了西方文明。书中对欧美国家图书馆的记录共有五处，分别在一、三、五此三编中。

第一编中有对使团一行人初到美国所参观的4所图书馆的介绍。这些介绍不仅涉及图书馆所在区域的地理文化特征，还重点说明了这4所图书馆的建立历史。记录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这些图书馆的藏书类型和规模。他们发现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无论是在规模还是类型上，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23]。

在第三编《欧罗巴大洲ノ部(上)》中，有关于使团参观“巴黎大书库”情况的记录，这也是实记中最为详实、内容最为全面的一部分记录，不仅有馆藏的介绍，而且还对该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以及管理制度作了阐述。首先是关于大书库布局构造的介绍，并详细描述了书库中“吊钩”的设计和作用。另外，除了记录书库藏书的数量和种类，还记录了书库运营资金的来源。它指出政府的支持是书库正常运营的重要保障，但是书库也会对需要借阅图书的读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以维持日常开销。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书库人员构成的记录，书库中不仅有专门负责吊钩工作的人员，还有管理书库桌椅设施的人员，在人员构成方面极为细致^[24]。

在第五编《欧罗巴大洲ノ部(下)》中，则有一卷关于瑞士书库的介绍，该篇记录提到在瑞士书库，外国人只要获得许可便可进入书库进行查阅。并且，岩仓使节团在该书库发现了一本介绍日本地理的书，书中图文并茂，研究详实^[25]。

通过对这些图书馆的参观，使节团为之深深震撼，也为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而担忧。不过这次出访更加坚定了使节们归国后投身于日本本土建设和改革中的决心^[26]。

3.2 田中不二磨与《理事功程》

介绍欧美国家图书馆最为详实的典籍当属田中不二磨编纂的《理事功程》。当时，田中不二磨随着岩仓使团一同出发访问欧美诸国，承担着教育文员的角色，出访过程中，他从教育视角重点考察和记录了出访国家的图书馆和教育信息，并将相关内容记录在了《理事功程》中。在《事由书》中单列条目规定了教育使节团的出使目的应为研究各国教育诸项规定，包括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并指出要“亲见官民学校、贸易学校，诸艺术学校、医院、育幼院之光景，研究将之用于我国之途径方法”^[27]。

在卷一《合众国教育略记》的《马萨诸塞州》中，对马萨诸塞州的“书库”进行了具体描述^[28]；卷四则重点对法国“书库”进行介绍^[29]。

从《理事功程》的记录中可发现欧美国家当时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的一些特点，一是在这些欧美国家，很多学校都匹配了学校图书馆供学生学习和查阅的资料，充分体现出了图书馆的教育属性；二是图书馆具有多样化的设立形式，比如公立、私立、学校等等，这些都丰富了这些欧美国家的图书馆事业。

1876年，田中不二磨参加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听取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报告书》，了解到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运营和管理模式。受此报告影响，田中不二磨归国后便创作了《美国百年期博览会教育报告》。报告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作了如下描述：“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公共图书馆应该本着免费的原则，对公众进行开放，从而成为公众获取知识和教育的主要阵地^[30]。

正是由于丰富的海外访问经历以及出访见闻，在归国之后，田中不二磨被迅速委任为明治时期的文部大辅，重点处理相关教育行政事务。同时，田中不二磨向明治政府倡议建立日本本土的公共图书馆，在他向文部省提交的《公立书籍馆设置的必要》中，指出公立图书馆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日本政府的职责和日本民众应享有的权利^[31]。

设立公共图书馆对于转型中的日本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民众接触到更为先进的文化知识，也有利于日本的制度转型和社会发展。因此，在田中不二磨倡议设立公共图书馆之后，明治政府逐渐开始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不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对图书馆的藏书提供保护。随后，日本各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普通民众对图书馆和知识获取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表2描述的是从1877到1912年日本国内设立公共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的数量统计情况^[32]。

表2 公立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的数量统计

年份	图书馆数量		
	公共	私立	总计
1877	5	2	7
1882	16	1	17
1887	9	5	14
1892	7	16	23
1897	9	21	30
1902	20	46	66
1907	46	104	150
1912	212	328	540

4 结论

不少学者将明治政府的成立视为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建设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前，人们多以“文库”一词来描述典藏书籍的场所。到了德川幕府时期，“锁国”政策阻碍了日本与世界的交流，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为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多支使团被派遣出使欧美先进国家。规模较大且影响较为深远的当属1860年向美国派遣的使节团和1865年萨摩藩政府派遣的赴英留学团队。在出访途中，使节团的成员们将其见闻记录在册，形成了宝贵的资料财富。这其中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建设吸引了众多日本学者，他们将这些图书馆信息详细记录，在归国后充分借鉴西方经验，积极投身到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当中。在1872年，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东京汤岛书籍馆正式开馆运营。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支人员构成更加丰富的使节团被派遣出使多个欧美国家。久米邦武编纂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和田中不二磨的《理事功程》中都对出访国

家的图书馆作了详实的介绍。

尽管200多年的“锁国”政策闭塞了日本民众和政府的视听，但无论是德川幕府还是明治政府，都积极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先进国家，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制度。正是通过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日本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博物馆和公立图书馆，并使其图书馆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直到今天，日本的很多成功经验仍然值得很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甘苦之. 从文库到图书馆——日本图书馆的发展沿革[J]. 图书情报知识, 1994 (1): 46-47, 41.
- [2] 李易宁. 近代日本对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受容与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最初形态[J]. 图书馆论坛, 2019 (2): 39-47.
- [3] 李永春, 刘钦, 万映辰. 19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对日本的冲击与德川幕府的应对[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13 (5): 754-758.
- [4]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 第1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 [5] 荒野泰典. “锁国”を見直す[M]. 东京: シーエーピー出版株式会社, 2003.
- [6] 箭内健次. 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M]. 东京: 吉川弘文館, 1988.
- [7] 大塚武松. 遣外使節日記纂輯(第一)[M]. 东京: 日本史籍協会, 1928-1930: 1-2.
- [8] 岡林伸夫. 万延遣米使節におけるアメリカ体験の諸相(一): 文化接触と対応の構造[J]. 大学紀要, 1986 (38): 54-90.
- [9] 服部逸郎. 77人の侍アメリカへ行く一万延元年遣米使節の記録[M]. 东京: 講談社, 1968.
- [10] 李易宁.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的体现[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8 (4): 98-104.
- [11] 冯新华. 镜像与还原——论美国学者笔下的日本人航美日记[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6): 111-118.
- [12] 丸山真男.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2.
- [13] 大塚孝明. 明治維新対外関係史研究[M]. 东京: 吉川弘文館, 1987: 87.
- [14] 門田明. カリフォルニアの士魂: 薩摩留學生長澤鼎小伝[M]. 东京: 本邦書籍, 1983.
- [15] 林竹二. 幕末海外留學生の記録[M]. 东京: 筑摩書房, 1985.
- [16] 門田明. 町田久成略伝[J]. 鹿児島県立短期大学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篇(第48卷), 1997: 12.
- [17] 福井迪子. 《畠山義成洋行日記》翻刻[J]. 研究年報(第15号), 1977: 10.
- [18] 川崎良孝. アメリカ公立図書館成立思想史[M]. 东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91: 179-186.
- [19] 博物館. 博物館図書並書籍館借覧規則等[M]. 东京: 博物館, 1872.
- [20] 裏田武夫, 小川剛. 明治・大正期公共図書館研究序説[M]. 东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68.
- [21] 袁灿兴. 岩仓使节团与日本的近代化之路[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 (2): 67-70.
- [22] 解晓东. 岩仓使节团及其对日本现代化的意义[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 68-71.
- [23] 李易宁. 明治初年岩仓使节团之欧洲图书馆考察探析[J]. 图书馆建设, 2018 (5): 95-100.
- [24] 久米邦武. 特命全權大使米欧回覽実記第3篇歐羅巴大洲ノ部(上)[M]. 东京: 博闻社, 1878: 52-53.
- [25] 久米邦武. 特命全權大使米欧回覽実記第五編歐羅巴大洲ノ部(下)[M]. 东京: 岩波書店, 1977: 196.
- [26] 吴维丽. 论日本明治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4, 24 (4): 158-160.
- [27] 李扬. 岩仓使节团的教育考察与新岛襄[J]. 才智, 2015 (10): 176-177.
- [28] 田中不二磨. 理事功程(卷1, 2合衆国)[M]. 东京: 文部省, 1873: 36-37.
- [29] 田中不二磨. 理事功程(卷4仏国)[M]. 东京: 文部省, 1873: 12.
- [30] 文部省. 米欧百年期博覧会教育報告(卷3・4)[M]. 东京: 文部省, 1877: 31.
- [31] 文部省. 日本帝国文部省年報: 第4(明治9年)第1冊米欧百年期博覧会教育報告(卷3・4)[M] 东京: 文部省, 1875-1914: 21.
- [32] 文部省. 日本地沟文部首第12年報[M]. 东京: 文部省, 明治17年度: 156.

作者简介 刘颖, 博士, 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廖远丽, 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胡大敏(通信作者, z5u2f6@163.com), 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9-03-28

(责任编辑: 邝玥; 英文编辑: 杨涛)